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古代中外文化 交流史

王小甫 范恩实 宁永娟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王小甫 范恩实 宁永娟 编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内容简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和各学科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大学课堂系统地讲授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知识也显得更为重要。让青年学生广泛了解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本国文化的性质和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对外交往中的健康精神和良好心态。本教材是为适应新世纪对新型人才素质教育的要求而编写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容全面,按时代顺序,尽可能分地域和类别介绍相关内容,要言不烦。二是资料新,尽量用新的考古文物资料来说明问题,既摆脱了排比罗列文献资料的窠臼,又增强了说服力,使叙述更加生动。三是观点新,本书尽可能吸收采用学术界的较新研究成果,尤其注意反映近年的学术发展。四是有别于同类专著,纲目清楚,各章附列重点难点、复习思考题和主要参考文献,既适合课堂讲授,亦便于个人自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 王小甫, 范恩实, 宁永娟编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ISBN 7-04-019015-X

I. 古... II. ①王... ②范... ③宁... III. 中外关  
系-文化交流-文化史-古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5996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3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9015-00

## 目 录

|                          |    |
|--------------------------|----|
| 导 论                      | 1  |
| 一、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1  |
| 二、交通网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平台    | 10 |
| 第一章 传说与考古材料中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的接触 | 23 |
| 第一节 中国古籍关于远古西方的记载        | 24 |
| 第二节 西方古籍关于早期东西方交往记载的追溯   | 26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          | 29 |
| 第四节 中国同朝鲜、日本的早期文化联系      | 32 |
| 第五节 中国同东南亚的早期文化联系        | 35 |
| 第六节 亚历山大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 37 |
|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中外接触和交流         | 41 |
|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立和交流      | 42 |
| 一、匈奴兴起前欧亚草原上的文化          | 42 |
| 二、由带具服饰看文化交流             | 44 |
| 三、匈奴与东、西交流的草原之路          | 46 |
| 第二节 月氏西迁与贵霜文化            | 51 |
| 一、月氏西迁                   | 51 |
| 二、贵霜文化                   | 52 |
| 第三节 两汉通西域                | 53 |
| 一、张骞通西域                  | 54 |
| 二、东汉经营西域                 | 55 |
| 三、匈奴西迁与民族大迁徙             | 56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斑斓多彩的西域文明       | 58 |
| 第五节 佛教传入中国               | 64 |
| 第六节 与朝鲜、日本的交流            | 68 |
| 一、秦汉时代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 68 |
| 二、秦汉时代与日本的交流联系           | 71 |
| 第七节 秦汉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联系      | 73 |
| 第八节 南海之路初通               | 78 |

|                       |     |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84  |
| 第一节 中西陆路交流的发展         | 85  |
| 一、丝绸之路上的东罗马文物         | 86  |
| 二、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与交流       | 90  |
| 三、南北朝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流往来     | 92  |
| 四、中外技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 96  |
| 第二节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 99  |
| 第三节 中亚粟特商胡来华          | 103 |
| 第四节 拜火教与祆神            | 108 |
| 第五节 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 110 |
| 一、魏晋南北朝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 110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 121 |
| 三、汉字汉文在越南             | 124 |
|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交通      | 124 |
| 第七节 纵横驰骋的骑马游牧民族       | 129 |
|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136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 | 136 |
| 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136 |
| 二、隋朝中外关系的发展           | 140 |
| 三、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 142 |
| 四、唐末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低迷     | 145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中外交通的主要路线     | 145 |
| 一、中外陆路交通的发展           | 145 |
| 二、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           | 151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中外人员流动与文化传播   | 153 |
| 一、隋、唐时期的外国侨民          | 153 |
| 二、中国人到海外              | 159 |
| 三、唐末五代西北民族迁徙及其历史影响    | 162 |
| 第四节 外来文明与隋唐社会生活       | 164 |
| 一、“三夷教”与外来宗教的大发展      | 164 |
| 二、域外科学技术的传入           | 170 |
| 三、外来艺术的流行             | 175 |
| 四、外来货币                | 176 |
| 五、外来植物与动物             | 178 |
| 六、外来文明影响下的唐代社会生活      | 178 |

|                           |     |
|---------------------------|-----|
| 第五节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   | 180 |
| 一、唐代文化西传 .....            | 180 |
| 二、造纸术的西传 .....            | 184 |
| 三、隋唐时代东亚文化交流的新发展 .....    | 185 |
|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 191 |
|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中外陆路交通 .....     | 191 |
| 一、宋朝的中西陆路交通 .....         | 191 |
| 二、辽朝对外关系的发展 .....         | 193 |
| 三、西夏对外关系的发展 .....         | 196 |
| 四、金朝对外关系的发展 .....         | 198 |
| 五、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       | 199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   | 201 |
|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         | 201 |
| 二、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       | 204 |
| 三、宋元时期的诸蕃水道 .....         | 206 |
| 四、考古发现的环中国海宋元沉船 .....     | 209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中外人员流动 .....      | 212 |
| 一、宋元时代中国人的国外游历 .....      | 212 |
| 二、蒙古西征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     | 217 |
| 三、“住蕃”与“唐人” .....         | 218 |
| 四、宋元时代外国人入华 .....         | 220 |
|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外来文明 .....       | 225 |
| 一、外来物质文明 .....            | 225 |
| 二、中国的犹太人和犹太教 .....        | 227 |
| 三、宋元时代的外来科技 .....         | 228 |
| 四、宋元时代的外来工艺技术 .....       | 230 |
| 五、宋元时代的外来艺术 .....         | 231 |
| 第五节 宋元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   | 233 |
| 一、瓷器外销 .....              | 233 |
| 二、丝绸的外销 .....             | 236 |
| 三、三大发明的西传 .....           | 238 |
| 四、中国书籍在东亚的传播 .....        | 241 |
| 五、程朱理学在东亚的传播 .....        | 243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 246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 ..... | 246 |

|                             |     |
|-----------------------------|-----|
| 一、明初的中西陆路交通 .....           | 246 |
| 二、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 .....          | 250 |
| 三、华人下南洋 .....               | 256 |
| 四、明朝后期的开闭关之争与清前期的闭关锁国 ..... | 257 |
| 第二节 中西初识与礼仪之争 .....         | 260 |
| 一、西方航海贸易势力的东进 .....         | 260 |
| 二、清代来华的西方使团 .....           | 263 |
| 三、西方教士来华及其活动 .....          | 265 |
| 四、中西初识 .....                | 268 |
| 五、礼仪之争 .....                | 272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 .....       | 273 |
| 一、天文历法 .....                | 274 |
| 二、数学 .....                  | 276 |
| 三、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 .....           | 277 |
| 四、地理学 .....                 | 278 |
| 五、生物学 .....                 | 280 |
| 六、医药学 .....                 | 281 |
| 七、西洋建筑 .....                | 282 |
| 八、绘画 .....                  | 284 |
| 九、音乐 .....                  | 285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     | 286 |
| 一、汉籍西传欧洲 .....              | 286 |
| 二、欧洲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      | 289 |
|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洲 .....         | 292 |
| 四、明清时期中国典籍的东传 .....         | 296 |
|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中外物质文明交流 .....     | 299 |
| 一、丝绸、瓷器的外销 .....            | 299 |
| 二、茶叶远销欧美 .....              | 302 |
| 三、明清时期输入中国的“西洋奇器” .....     | 304 |
| 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 .....            | 305 |

## 导 论

Ex Oriente lux, ex occidente lex (“光明来自东方，法规来自西方”)，这句西方谚语旨在表明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特点有所不同，因而必然会发生交流。我们今天也可以从这一视角切入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回顾。

### 一、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文化，一般的定义是指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或者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也专指社会意识，包括浅层的如技术、科学、习俗，深层的如思想（政治的和法律的）、道德、文化、艺术、宗教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

西方哲学家多把文化看作自然的并立物，包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这与我们上述定义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劳动创造了人，所以人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件产品。同时，人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进化论认为人类出于同源，这无疑是对的。近年的基因研究揭示，现代人类（晚期智人）起源于非洲东部，中国人也不例外。现在世界上各个种族的所有居民（包括中国的各个民族）都是15万年前一对东非配偶的后代（有人将之称作亚当、夏娃，我们也不妨视之为伏羲、女娲），大约到10万年前；今天欧、亚和美洲人种的祖先离开东非向北扩散。人们凭借基因研究的证据与考古文化结合，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历史上现代人类各主要种群的迁徙路线，以及出现分化的具体时间和地点。<sup>①</sup>

现代人类迁出非洲以后，各地文化在不同的环境分别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了不同特征。<sup>②</sup>文化史资料表明，即使是同一祖先的后代，经过长期发展，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产物也会具有不同的特质。正因为不同文化各有特色，它们之间才会产生交流现象。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又

① 昆明动物所：《人类走出非洲的迁移路线研究取得新突破》，见“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ac.cn/html/Dir/2004/12/22/0968.htm>。 阎宏：《基因研究揭示人类迁移中国人祖先源于东非》（原稿载《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见“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20050510/3136682.shtml>。

② 见《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

构成了文化交流的现实基础。所以可以说，异质方产生交流的必要，相似构成了交流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法，即在异质文化中发现相似现象，进而追溯其起源或由来。

1979年5月，位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因193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分布区中心地带的辽宁西部喀左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在中国首次见到的陶质妇女裸体小塑像。这类小塑像在国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多有发现，被称为“早期的维纳斯”，实际上多为丰产崇拜的形象。有关这种塑像的起源，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即：布尔奇特（M. C. Burkitt）的东方（乌克兰以东）起源说，奥克拉德尼科夫（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等人基于考古学、地质地理学的见解提出的西方起源说，列文（M. G. Levin）提出的各地自生说。东山嘴祭坛（公元前3000年左右）发现的两件陶质无头女性裸体小像残体分别高5厘米和5.8厘米，凸腹丰臀，是典型的孕妇形象。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她们同国外那些“早期的维纳斯”一样，也是作为丰产崇拜的形象而被塑造出来的。当然，仔细研究起来，要把中外这种象征丰产的小塑像联系起来并非没有困难。例如，介于中国和西亚、欧洲之间的中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初至前3000年初）的这种塑像，其发展趋势一般是由丰腴的立像到瘦削的坐像，而且多以手、乳（有的就是由双肩发展而成）的有无分类。可是，中国辽西的小塑像在绝对年代上大致与中亚相同，有手无乳，却已取“倚坐式”姿态了。更为重要的是，1983年以后，在东山嘴以西50公里凌源市的牛河梁又发现一座女神庙遗址和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均已5000多年历史。这些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大小不等的泥塑女性裸体像残块，其中特别珍贵的是，女神庙主室西侧发现的群像中有一尊仿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该像头部基本完好，塑像采用圆雕手法，程序与中国现代塑像基本一样。女神的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的，显得炯炯有神。这些，都说明红山文化的彩塑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单凭这些，我们并不能就象征丰产的裸体妇女小像的起源和传播方向作出判断。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丰产女神像就起源于东方。因为，不仅在辽西与中亚的这类塑像间缺乏中间环节，而且，实际上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地处法国南部，时代为晚更新世，即最迟在距今1万年以前）中就已出

现了造型非常一致的体态丰满的孕妇小塑像，如奥地利的维伦多夫（Willendorf）出土的妇女小塑像，推测是丰产女神。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样遥远的古代，在欧亚大陆这样辽阔地域上那些看起来并无联系的人们中间，会产生同样的崇拜和相似的艺术？或者说，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呢？不同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早就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数人类学中的社会进化论者，其杰出代表就是 19 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1877 年，摩尔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古代社会》问世。在该书自序中，摩尔根说：“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成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同时，各种社会制度，因与人类的永恒需要密切相关，都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它们也同样成为进步的标志。这些制度、这些发明与发现，体现并保存了迄今仍然可以说明这种经验的一些主要事项。将这事项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摩尔根的这些说法代表了社会进化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观点。

1860—1880 年，进化论学说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不仅影响到欧美国家，中国以严复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也翻译了许多进化论学者的著作。中国民族学早年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也属于进化论派。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派在英国最有势力，其代表人物有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马雷特（Robert Ranulph Marett, 1866—1945）、哈登（Alfred Cord Haddon, 1855—1940）、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弗雷泽及其同时代人曾编辑了相似习俗的庞大目录，以阐发进化论原则。<sup>①</sup>

法国文化人类学中的社会学派可以说是进化论的一个支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涂尔干（E. Durkheim, 1858—1917）同进化论派一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却反对进化论的共同心理学说。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是他的外甥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莫斯还是英国进化论派学者泰勒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是法国社会学派的一位大师，也是涂尔干与莫斯的学生。同时，他还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 1865—1918）的学生。葛兰言曾于 1911—1913 年和 1918—

<sup>①</sup> 本书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介绍主要参考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1919年两次到中国实地考察，1926年起任巴黎中国高等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2卷、《中国古代之陵制》、《中国宗教史概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

莫斯的另一个著名学生就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理论很复杂，他在自传式的著作《苦闷的热带》一书中，曾把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和地质学比作他的三个“情妇”。他在社会和人类学方面受涂尔干和莫斯的影响较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把结构主义（关系形式）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认为：当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最先得到的印象是差异。但由于所有的文化又都是人脑的产品，因此，在文化的表面现象之下必定存在某种大家共有的特征。这些从本质上讲都属于社会进化论思想。当然，地球上两个不同地区习俗的相似，并不是列维·斯特劳斯注意的中心。他只是要说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是属于结构意义上的（普遍的“人类心理”或者说智能人种对自然界中关系形式应有的甚至是本能的反映），而不仅是表面事实意义上的。

文化人类学中与进化论对立的是传播论。传播论又叫“历史学派”或“文化史学派”。英国是进化论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传播论的发源地，其主要代表是史密斯（G. Elliot Smith，1871—1937）及其门徒佩里（W. J. Perry），他们被视为极端传播学派。由于他们认为人类最初的所有文化都来自埃及，故又称为“泛埃及学派”。史密斯认为：并非每个民族都具有创造文明的内在冲动。文明的起源是唯一的，一经创造就只有不断的传播，不能再有同样的创造。佩里最有名的著作是《太阳之子》，他在这本书中将埃及比作太阳，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的古代文明全是从埃及传播来的。

德国的文化圈学派被认为是传播论在德国的支派，有人也将这一派称作“德奥历史派”、“德奥文化水平学派”或“莱比锡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是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他在其名著《人类地理学》中提出，地理环境能对人类文化起决定作用。拉策尔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从别的民族文化借来的。不过，这一学派真正的开创者却是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1877—1934）。格雷布内尔在拉策尔提出的“形的标准”（即有着共同外形的物质文化来自同源）和拉策尔的弟子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1873—1938）提出的“数量标准”（即考察各文化间的相同因素的数量，以确定是否来自同源）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了“文化圈”和“文化层”的概念。他认为，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文化圈重叠便成为文化层。他反对进化论派关于人类有共同的心理素质、所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学说。根据他的论点，各个民族的文化难于独立产生和发展。仅有少数几个地区的少数几个先进的民族才能产生和发展文化，形成以这些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他所说的民族的文化，就是从这些先进民族的文化传播而来的；整个人类文化史就是几个文化综合体（即文化圈）在地球上移动的历史。

格雷布内尔的这些论点，后来由奥地利天主教神甫施密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和科佩尔斯（W. Koppers, 1886—1961）两人进一步发展，并使之天主教神学化，故又被称为天主教学派。施密特继承了格雷布内尔的理论，认为不同地区的文化，不管它们相隔距离和地域是否连接，只要符合“形的标准”和“数量标准”，就可以认为彼此有历史关系。此外施密特又提出“连续标准”和“亲缘关系程度标准”作为补充。前者是指在两处相隔较远或无连接的地方，如果在其中间地区发现土著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即使这些文化因素不一定很明显、很完整，只要有残存或遗迹，便足以增强这两地过去有过联系的可能性。后者是指互相隔离的两地文化，其文化因素的“形”的类似程度之差和数的多寡程度之差，构成亲缘关系程度之差。如果两处文化的类似因素在形的方面越显著，在数的方面量越多，越证明两处文化并非独自产生，而是两地有历史联系和传播的结果。1935年，施密特本人两次到中国，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作学术讲演，对中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美国人类学中的历史学派或称“批评学派”，该派的代表人物是波亚士（Franz Boas, 1858—1942），因而又被称为“波亚士学派”。波亚士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念完大学，所以主要受德国文化圈学派的影响。他把“历史的重造”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一，这和进化论派的目的是一样的。波亚士提出了与“文化圈”相类似的“文化区”（Culture area）的概念，但强调同在一个史地单位区域的意义。此外，波亚士还提出了“文化中心”和“文化边区”的概念。前者指在一个文化区内表现其文化特征最浓厚的中心地区，后者指在一个文化区内表现其文化特征较为淡薄的边缘地区。波亚士认为，“文化边区”是相邻的文化区之间的过渡区域，其文化内容由相邻各文化区的文化特征混合而成。

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人类学中进化论与传播论都开始衰落时，在英国

产生了功能人类学派。他们与以前各派为了了解某个民族文化的起源或传播而注重对文化的“形”的研究不同，他们重视对文化的功用，即文化的功能的研究，因而被称为功能学派。这派的创始人之一是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他的功能学说认为：人类的目的是在生活，这是生物界的常态，文化即人类用以达到生活目的的手段。文化形式具有种种变异，但就其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功能而言则绝对相同。1931年，马林诺夫斯基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卷撰写的《论文化》条目说，功能派承认文化的差异性，不问文化的起因，只问文化是什么，它怎么发生作用，怎么变迁；各个文化间的差异性虽然很大，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相同之点，因为文化常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一组同一的问题。这里所谓同一的问题主要是人类有机体的生物需要，不过，在这些满足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又生出一系列派生的、手段的和完整的文化需要。英国功能人类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是布朗（A. R. Radcliffe-Brown, 1881—1955），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地位逐渐超过了马林诺夫斯基。1935年秋，布朗曾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聘来中国短期讲学。20世纪50年代以前，功能派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影响较大，造就了一批学人，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迄至20世纪末期，新考古学派在英美学术界占有很大的势力，这一学派产生的标志是1960年新考古学家宾弗（L. Binford）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论文。新考古学派的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说来，该派有如下特点：（1）注重文化生态学；（2）采用“系统论”以了解文化；（3）注意方法而不求个别文化的深度研究；（4）以寻求文化社会变迁程序及法则为主要目的。新考古学派在研究史前史经常使用两种基本概念：一种是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意为地域相连而各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它们对于其他地域关联较远的文化来说形成一个整体，例如“东亚文化圈”；一种是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意为一个地区长时间互相关联的诸文化相勾连而构成历史的整体单位。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相同的。新考古学派者认为，交互作用圈代表的是地域性生态系统。地域性生态系统内又有区域性或可称为亚地域性的生态系统（如东亚之下又有东北亚、东南亚）。这样的生态系统在文化上有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地域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尽管没有任何地域的文化发展是孤立的，但每个地域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要比不同地域之间（如东亚

与之西亚，西亚之与北美）的交互作用频繁、深刻得多。

新考古学派的另一代表是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张光直，他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变到文明时代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一种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有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例如各种形式的天地人神的沟通，只不过到文明社会被统治者独占、垄断起来了。后者即西方式是一种突破式，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例如金属工具用于灌溉渠道的建设，地缘关系取代亲缘关系而导致国家的产生，由于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而产生文字，城乡分离，等等。张光直认为，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古代文明的若干因素，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连续性都与中国相似。他特别比较了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指出：与中国文明相似，玛雅从史前到文明的转变也没有牵涉到技术上的突破，他们在生产工具上仍使用史前时代的石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其新兴的阶级社会中，仍然是通过宗教仪式行为来掌握和决定政治行为；文字也完全是在仪式、政治和历法上使用的；亲属制度、氏族制度或者说宗族制度，也与国家强烈结合，与城市密切结合；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亦把世界分为三层，由宇宙之树串通不同的层次，人通过树和其他的工具也可以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宇宙树上有鸟，鸟也是人神的重要助手；玛雅的陶器和艺术品中的动物也有很大的重要性，动物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沟通不同世界的助手，比如神犬，等等。继续比较下去还可以看到，整个中美洲的文明是个连续体。<sup>①</sup>

张光直对中国文明与中美文明相似的解释是：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称作“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目前只对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了解得比较清楚，而实际上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文明或玛雅文明起源的时间，至少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张光直提出，两三万年前大部分印第安人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到美洲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文化内容的丰富可能令人意想不到，可以有相当把握举出的是巫术和萨满文化。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巫师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之间往来，他从事这种沟通时有这样一些助手和工具：各种法器，其中可能包

<sup>①</sup> 参考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括葫芦、酒、药物，各种动物和天地柱（形如我国浙江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和天地沟通）。植物学家相信葫芦的来源只有一处，而古代在非洲、亚洲、美洲都有发现。因此，有人认为它是由传播而扩散四处的。葫芦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做容器，有的道士或凡人就用它来装酒，有北方民族的萨满用它盛各种药物。有人想象印第安人过白令海峡时腰上就挂着葫芦。当时印第安人还十分可能具有的文化成分是：进行人物或绘画时只表现其内部骨骼或内脏的所谓“X光式的美术”、“枪矛投掷器（atlatl）”、洞穴艺术、对自然历法一定程度的认识，等等。总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尤其是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达程度，远比我们现在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通常只有少数的石器类型）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在这种程度很高的文化基础上，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就产生了相似的文明社会。只是在公元前4000年后期，才在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中部和南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发生了西方式文明的突破，即产生了苏美尔（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

近年还有人进一步从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证“创造了世界古文明之一的美洲玛雅人和中国人在五千年前曾经是一家人”。<sup>①</sup> 尽管从目前的材料看，还不能完全解决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sup>②</sup> 前述证明现代人类出于同源的基因研究还是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张光直等对早期亚太地区文化传播的设想：“在2万多年前，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就有一支部落沿着海岸线往上跑。几乎就没有留下沿途停滞的痕迹。他们一直跑到西辽河流域再停留下来。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核心。后来夷人上去了，华人也上去了，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形成兴隆洼文化。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进入新石器文化的地方。之后那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又朝周边迁徙，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sup>③</sup>

面对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取其折中，他认为，有些东西是某一民族对人类知识和力量的总和所作出的贡献（因为它们已经传播开并被其他各个民族所利用），而有些东西则确实是在几个地方分别独立完成的发明，因而是几个民族的共同贡献。比较受到普遍支持的观点，似乎总是更有道理些。他还引用了狄克逊（R. B. Dixon）的

① 胡春洞：《玛雅人和中国人的亲缘关系》，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5日第23版。

② 龚缨晏：《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

③ 阎宏：《基因研究揭示人类迁移，中国人祖先源于东非》，载《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

说法：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干而又很相类似的特征，也许可以用传播的作用来解释；可是这里仍留下大量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各地的独创。在严重缺乏物证时，宁可取各自独立发明的说法，或者趋同作用来解释。人类学家这里所用的“趋同”这个词汇，其意义和在讨论生物进化时所用的意义相似，即：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异体同功而不是异体同形的结构必然变得彼此相似。“趋同”这个词用在社会的进化上时，可能只意味着在遇到同样的较简单的问题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它。因此，人们可以设想，在互相隔绝的各种文化中有不少并行的相似的发展，特别是在较早的阶段。因为，环境和人的本性对事物的可能性有相当大的限制，例如，装饰品只能从耳朵或鼻子上挂下来，纤维只能用搓捻来纺织，斧头只能装在柄上（大约只有10种可能的装柄方法），等等。在知识领域，也有与这些简单情况相似的事物，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的书中同时出现了“灵魂阶梯”型的理论，埃利亚学派<sup>①</sup>的诡辩和惠施（约前370—前310，中国战国时名家的代表人物）的诡辩也是同时出现的。还有，世界各地所制订的计算日月星辰出没时间的规划和图表都非常相似，等等。<sup>②</sup>

李约瑟指出，思想、发明、技术或机械愈是简单，它在世界各地独创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这一原则有一个条件，就是产生这种发明的文化所达到的复杂程度如何。最可能的设想是认为这些技术先在某处产生，然后从那里向各方流传出去。人类仿造的能力（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不断增长，手工和智力两方面的技能变得越来越精，并且传播得越来越广。总之，可能传播的发明，其复杂程度随一般文化成就的上升曲线而上升，初期简单，然后逐渐复杂。而在适当期间（这种期间大致是逐渐缩短的）内可能证明为独创性的发明，其复杂程度应当随可能传播的发明的复杂程度而上升。技术，尤其是那些简单的、可以立刻付诸实用的技术发明，能够优先得到传播。比较起来，整套思想体系的传播似乎存在着先天的不可能性，因为思想体系无疑地要受到各种独特的种族特征的限制。不过，应该认为，这些思想体系的点滴片段，还是有可能传播的。这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技术层面居多，思想层面很少的原因。

最后，李约瑟关于中外科学技术交流的概述是值得在这里引用的。他说，

<sup>①</sup>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学派，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南部古希腊人居留地埃利亚（Elea），其地在今那不勒斯附近。

<sup>②</sup> 参考〔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中国的科学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之前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尽管知识交流的机会要比一般所想象的多得多，可是它和西方科学却很少有共同之处。中国的技术发明在公元后的十几个世纪中，曾不断地倾注到欧洲，正如后来的技术潮流流向东方一样。李约瑟举了一些有关机械的和其他技术由东向西传播的实例，他指出，所有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在中国应用的时期，确实早于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时期。当然，在 17 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期间，也有一些西方机械技术传到了中国。

综上所述，无论从那一种理论学说来看，人类文化都存在着本质的、固有的联系，而且，早在史前时期很久，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不容怀疑的。我们这本教材，就是想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例，向大学生和一般读者表明，历史上的中国并非是全封闭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是排他性的保守文化。确实，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和认识这一问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有一个距离上由近到远，方式由间接到直接，内容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的趋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流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发展、逐步扩大的。历史证明，人类文明越发展，传播与文化交流的作用越重要。<sup>①</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必然会越来越紧密。正如我们当前所见，随着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然，交流在促使“趋同”的同时，也不断产生新的多样性。李约瑟曾说：“在社会进化的进程中，如在技术上已经多次发生过的一样，一种概念传入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性。”现在，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相信，通过对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历程的真实回顾，可以振奋起我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 二、交通网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平台

### 1. “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

<sup>①</sup>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社会和国际学术的发展，所谓“社会进化论和文明传播论的争论”应该说已经不成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分别适用于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化发达的不同程度时的情况。显然，社会文明越低下，文化性质越简单，其产生和存在越不需要交流；反之，人类文明越发达，文化性质越复杂，传播和交流在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大。有关上述争论，参见赵敦华：《古史研究中的“帕斯卡猜想”》，收在罗秉祥、赵敦华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3～194 页。